

中国文学家的故事(二)

徐公恃等编写

插图：戴敦邦

中国文学家的故事(二)

徐公恃等编写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6印张 96千字

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5,000册 定价0.35元

书名题字：茅 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继中国文学家的故事（一）之后，介绍宋至清十九位著名文学家的主要事迹，以及他们的主要作品。这些文学家往往是政治上失意、饱经忧患的人。他们关心国家、民族的命运，同情民生疾苦，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优异的创作才能，写下了许多出色的作品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；有的还反映了人民被剥削、被压迫的现实生活，多方面地表现了他们生存的时代。本书可以帮助初学者掌握中国文学史基本知识、初步阅读古典文学作品。

目 次

王安石	(1)
苏 軾	(11)
李清照	(21)
陆 游	(30)
辛弃疾	(41)
关汉卿	(51)
王实甫	(60)
罗贯中	(69)
施耐庵	(79)
吴承恩	(89)
汤显祖	(99)
冯梦龙	(109)
蒲松龄	(119)
吴敬梓	(129)

曹雪芹	(139)
龚自珍	(150)
黄遵宪	(159)
吴趼人	(169)
李伯元	(178)

王 安 石

(一〇二一——一〇八六)

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诗人们精心提炼、反复修改诗句的故事。唐代的贾岛把“僧推月下门”改为“僧敲月下门”是很有代表性的，因此产生了“推敲”这个词。此外，宋代的王安石对自己的诗句进行多次修改，也是很著名的事例。王安石写的是这样一首诗：

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

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

——《泊船瓜洲》

京口就是镇江，瓜洲在江北，与镇江隔江相对；钟山在南京城外，是王安石的家乡。这诗前两句说，他当时身在瓜洲，离家已经很近了；后两句说，现在春天又来到了江南，我因公事缠身，不能回家看看，什么时候我才能在明月照耀下，去领略家乡的春光呢？

这一首思乡作品写得相当好，多少年来流传很广。但这诗的第三句最初是这样写的：“春风又到江南岸”，这个“到”字很一般化，不好。他先改为“过”字，又改为“入”，再改为“满”，

然而这些字都不够精彩，于是他再改，一直改了十多次，才最后改定为“绿”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这个“绿”字比前面那些字的形象性都好。因为春风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，怎么知道它已吹到江南了呢？春风吹，草木发芽，江南大地一片新绿，万物都充满着生机。“绿”字把春风非常形象地表现出来了。一字之易，使全句倍增文采，也使全诗的形象更加鲜明、意境更加优美了。

王安石这个人在历史上既是著名文学家，也是个杰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。他祖籍江西临川，所以后人又叫他“王临川”。不过他从小在金陵（南京）长大，很少到临川去。王安石自幼就表现出了学习方面的两个特点：一是好学不倦，刻苦读书。他曾说过：他从诸子百家，直到《难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本草》（这些都是一般人不大读的书）、各种小说，无所不读。由于他读的书多，所以知识非常丰富。后来他执政了，从事改革，常有反对派找他辩论，可总是被他驳得张口结舌，狼狈不堪，他就说那些人：“你们就是读书太少了！”二是能够本着学以致用精神，关心社会现实，把学到的书本知识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，思考着如何为国家兴利除弊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同那些光是钻故纸堆的书虫禄蠹[dù]大不相同。正因为从年轻时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所以他后来诗也写得好，政治上也轰轰烈烈地做出了一番事业。

王安石二十一岁就考中了进士，按考卷的成绩，他应当是第一名，主考官也已初步确定他为状元了。但后来发现他卷子里有一处犯了“讳”，所以又改为第四名。考中进士后，王



諸君生不讀書耳

十年元月 敦邦漢記 三石作 中國文學家下冊 國



“你们就是读书太少了！”

安石就开始做官。他先后在扬州、鄞[yín]县(今浙江宁波)、舒州(今安徽舒城)、常州等地担任地方长官。他在这些地方官任上,工作勤勉,作风朴素,很有些清正的名声,获得老百姓的欢迎和舆论的好评。

北宋那时候,当地方官权力有限,待遇也不算高,而且比较辛苦,所以一些贪图名利禄位的人,都削尖了脑袋钻到首都汴京(今河南开封)去当“京官”。按照规定,象王安石这样进士及第的人,只要当满三年一任的地方官,就可以申请到首都去当京官。但王安石一连干了好几任地方官,也没有递过一张申请书。他是这样想的:从个人前途考虑,自然当京官好;但自己到中央政府后,一切都得听命办事,不能自作主张,还不如当个地方上的首长,有一定的行动自由,可以做出一些切实的事情。他当了十五六年地方官,干得乐而不倦,很带劲儿。

在地方官任上,王安石的道德品格和学识文章越来越为人所知。有这样一件事:他的一个同僚有一天早晨在衙门里碰到他,见他衣冠不整,脸都没洗,以为他在家通夜酗酒,就给他讲了一顿大道理,批评他不该如此放纵。王安石听了,只点头称是,毫不分辩解释。过后那个同僚才知道,原来王安石天天在家读书读到深夜,根本没有酗酒。事情传开去,人们都很感动,佩服他胸襟开阔、作风磊落。到后来,朝廷里的一些元老重臣,如文彦博、欧阳修(他也是一个有成就的文学家)等,也都对他交口称赞,并在皇帝面前多次荐举他。公元一〇六七年,宋神宗赵顼[xū]登位。这位年方二十的新皇帝,感到

国家积弱不振，很想改革一番，重振国威。他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帮手，来为他出谋划策，主持改革事业。但他坐在龙椅上举目一望，满朝大臣没有一个合他意的。于是他打定了主意，叫王安石来。

王安石一到开封，神宗就委以全权，叫他当副宰相、宰相，着手改革。在历史上，这就是著名的“王安石变法”，因为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所以又叫“熙宁变法”。王安石分析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各方面问题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，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“新法”。这就是：均输法、青苗法、农田水利法、募役法、市易法、方田均税法、保甲法、将兵法等。这些新法的内容相当复杂，这里几句话说不清楚。反正制定这些新法，都是为了要纠正社会上赋税负担严重不平均的现象，适当减轻下层贫苦人民在赋税、劳役、兵役方面的负担；要限制大地主、大商人的掠夺性剥削和疯狂兼并；要鼓励发展农业生产；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，节约开支；要加强武装力量、抵御外侮。王安石推行“新法”，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，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，但这些措施客观上对发展生产、稳定人民生活有好处，所以有进步意义。通过王安石变法，宋朝在短短几年内，国力果然有所增强。公元一〇七三年还在一次对外战争中打了胜仗，收复了大片失地。这在整个宋朝历史上都是少有的事。

但是，反对变法的人不少，其中有些是代表大地主、大商人利益的显贵官僚，也有一些是思想守旧的人，对王安石在政治上搞新名堂看不惯。新法一件件推行出来，他们的反对也愈

益厉害。他们的代表是司马光，就是著名的历史书《资治通鉴》的编者。他几乎在每個问题上都要同王安石唱反调。另外，当初很赏识、并多次荐举王安石的文彦博、欧阳修等老先生，也逐渐对新法持不满态度。还有一些开始时赞成变法，因而被王安石提拔重用的人，到头来也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，转而反对新法。这说明了在封建时代里要搞点儿改革，是多么困难，阻力有多大。但王安石不管这些，他不顾反对派的明枪暗箭、冷嘲热讽，坚持搞下去。不过，王安石变法靠的是皇帝宋神宗，而神宗后来也受了种种影响，对新法有些动摇了，于是王安石只好于一〇七六年辞职回金陵去。王安石走后，他的新法还勉强继续实行着，有一段时间，他还曾有过短暂的复职。但是一〇八五年宋神宗死后，朝廷里形势大变，司马光当上了宰相，新法就被他全都废掉了。王安石先后在金陵闲居了十年左右，终于忧愤死去。

王安石在历史上，一向是受人诬蔑的。有人说他的熙宁变法使宋朝伤了元气，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。有人把他同汉朝的王莽相提并论，说他是个“奸臣”。还有人则编了小说来攻击他，小说题目叫《拗相公》，里面写王安石“性子执拗，主意一定，佛菩萨也劝他不转，人皆呼为拗相公”；说他的儿子因为王安石变法，死后在阴间被刑受苦；又说他本人在辞官回金陵的路上，看到听到老百姓都反对新法，最后回到家里气得吐血而死。这些当然都是无中生有的胡编乱造。

因为王安石是个政治家，所以他的文学创作同政治有密切关系。他写诗、作文的主要内容，就是宣传他的变法思想和

主张。例如他在变法前作有一首著名的《感事》诗。诗中写贫苦百姓们在丰年也吃不饱肚子，碰上水旱灾害，生活就更悲惨，加上一些官吏作威作福，弄得“十室灾八九”，每年冬、春，总有不少人饿死，而那些当官的还自鸣得意，自称是“民之父母”。诗人以强调的语气说：现在虽还没有出大的乱子，但万一发生了，那可没法收拾了。这是对统治者的严厉警告。这诗写得大胆、深刻，读了令人怵目惊心，它揭示了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。又如他的《兼并》诗，斥责了大富豪疯狂兼并、聚敛财富的罪恶，他们一方面使老百姓愈来愈穷，另一方面也使中央政府财源枯竭。他主张制止兼并，把财权集中到中央来。王安石有时还以写诗的方式来驳斥那些反对变法的顽固派。如有一首《众人》诗写道，“众人”在那里乱嚷嚷，他们所攻击的其实都不是我的错处；一个人是美是恶，全看自己做得怎样，根本不在于“众人”怎样议论。这里的“众人”就是指反对派。王安石即使在写咏史诗的时候，也总要紧密联系现实，把着眼点放在政治上。他在一些咏史诗里，特别对古代的政治改革家表示敬仰，他赞扬战国时期的商鞅，说“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”；他推崇诸葛亮能够“虚心”、“得贤”，并感叹说：“余风今日更谁传？”隐隐然以诸葛亮的继承者自居。

这种政治性强的特点，在王安石的散文中更加明显。他的散文包括奏议、书信、杂论等，是他推行变法的有力工具。如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文章结构宏大，洋洋万言，包含了他关于改革政治的基本想法。《答司马谏议书》是一篇短文，是专门驳斥司马光攻击新法的，这类文章，在王安石全部散文中

占极大比例。无病呻吟的文章，在他的集子里可以说是找不出的。

王安石的散文和诗，艺术性都很高。在我国散文史上，他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大家。在著名的“唐宋八大家”中，他是一家。他的散文特色，有人评论说是“笔力简而健”，就是简洁、不烦琐，而且刚健有力。如司马光长篇大论地攻击他，非难他，而他的那篇《答司马谏议书》却只写了几百字，就既明确有力、又非常得体地把司马光反驳了回去，一时被传为美谈。清末有一位改良派政治家兼散文家叫梁启超的，他对王安石的散文佩服得不得了，他说，我研究王安石的文章，恨不得把他的全集拿来亲手再抄一遍。

王安石诗歌的艺术水平，我们从开头所引的那首《泊船瓜洲》中，已经有所领略了，那是写得非常精致优美的。这类诗他还写过不少，特别是晚年闲居钟山脚下“半山园”时写得尤其多。这里再举一首《金陵即事》（之一）：

水际柴门一半开，小桥分路入苍苔。

背人照影无穷柳，隔屋吹香并是梅。

这是写他的“半山园”景色的。从门口写到院内，又从自家写到邻舍，写得很有层次。而每一句都分别写出了一个优美的画面。后代有人评论说：“此诗吟讽不足，可入图画。”还有一首《书湖阴先生壁》：

茅檐长扫静无苔，花木成畦手自栽。

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闥送青来。

“湖阴先生”是王安石的朋友杨德逢。这首诗写杨家的幽静和雅洁，以及环境的优美、富于自然情趣。后两句具有很高的修辞技巧，“护田”和“排闥”都是用的《汉书》里的典故，两句的句法也从前人的诗里演化而来，但是，王安石把它们写得如此明白晓畅，使人不觉得他在用典故，看不出有什么演化的痕迹。这说明诗人遣词造句功夫老练，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
以上介绍的都是七言绝句，下面再列举两首五言绝句：

爱此江边好，留连至日斜。

眠分黄犊草，坐占白鸥沙。

——《题舂子》

日净山如染，风暄草欲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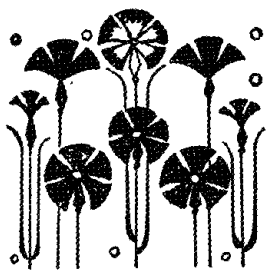
梅残数点雪，麦涨一川云。

——《题齐安壁》

这两首诗的共同特点是用字精练简括，而形象优美生动。前一首诗没有一字写人，但是它通过“爱”、“留连”、“眠”、“坐”，让读者感到每句都在写人，有一个人在诗中活动；第三、四两句，绘出了一幅美丽雅致的风景画，这幅画充满着自然野趣，而且色彩感很强，由黄（“黄犊”）、绿（“草”）、白（“白鸥”）、赭（“沙”）四种色调构成。后一首诗纯写自然景色，它每句都用了一个比喻，用得极好。特别是最后两句，把残存的梅花比作“数点雪”，把麦浪掀动比作“一川云”，非常出色。

当然，王安石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一些缺点，他在有些诗（不是所有的）里，话说得太直、太露，意思虽好而不够含蓄，形象性受到一定影响。例如有一首《读墨》诗写道：“谁为尧舜徒，孔子而已矣。人皆是尧舜，未必知孔子……”，有人评论说：“介甫（王安石的字）《读墨》诗，终篇皆如散文，但加押韵尔。”这种缺点，其实也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，宋代的许多诗人都程度不等地有这个毛病，他们爱“以文为诗”，即拿写散文的方法来写诗，还“以才学为诗”，即喜欢在诗里显示自己的学识、堆砌典故，这是一种时代的特点。在这一点上，宋诗是要比唐诗差一点儿。因为王安石是我们这本书里介绍的第一个宋代诗人，所以这个问题放在这儿说一下。

（徐公特）



苏 轼

(一〇三七——一一〇一)

就在王安石晚年闲居在钟山脚下“半山园”的时候，曾有一个四十来岁的晚辈官员前来专程拜访他。这人一见面就说：请允许我穿着便服来拜见您大丞相！其实当时王安石已经罢了官，这不过是对王安石尊敬的表示。王安石很亲切地接待了他，同他一起观赏山野风景，同时谈论学问文章。住了几天，那人告辞去了，王安石感叹地说：象这样有才华的人，正不知要多少年后才能再见到！这个人就是苏轼，北宋时期的一位才气横溢的文学家。

苏轼字子瞻，号东坡，四川眉山人。出身于书香门第。他同王安石一样，也在二十一岁上就考中了进士，中进士后不久也就开始了仕宦生涯。不过苏轼一生虽然不断地做着官，做了四十来年中央和地方上的各种各样的官，但他在政治上一直不怎么得意，老是受着别人的排斥打击。他曾许多次被贬官，有一回还被抓了起来，押到首都汴京治他的罪。他在晚年还曾被放逐到遥远的广东、广西一带去当个小官吏，直到死之前半年才被赦回。

苏轼政治道路的坎坷不平，是同那时的政治背景以及他

本人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的。当时的政治背景，主要的就是上一节里介绍过的变法与反变法的两派势力之争。双方都视对方为仇敌。而苏轼呢？他的情况很复杂。首先，他是基本上持反对变法态度的，这就决定了在熙宁变法时期他不可能受重用。其实他同王安石的个人关系，如同我们开头所写的，从来都不错，所以王安石当丞相时，他还没有受到什么打击。只是王安石干了几年被罢相之后，他的一些继任者继续推行新法，对他就很不客气，一连串的贬斥就落到他头上来了。可是，等到新党失败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后，他的处境却依然不见好转。这是因为他对旧党总是从派别角度来处理国事，也很有意见。对于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地废掉王安石的全部新法，他曾提出过不同看法。他认为王安石新法太激烈，不好，但其中的“免役法”还是可取的。司马光不听他的意见，他就发脾气骂道：“司马牛！司马牛！”司马牛是孔子的一个学生，爱瞎说八道，性格暴躁。旧党为此对苏轼很不放心，暗地里把他当作第二个王安石加以提防。过了十几年，新党又把旧党打了下去。这时候的“新党”，其实本质上已同旧党没有多少差别，他们已经不是要搞什么变法了，而是成了一个争权夺利的官僚集团。在他们眼里，苏轼自然是旧党中人，所以又对他横加打击。苏轼就是这样两面被排斥，老是不得志。

苏轼在政治态度上偏于保守，这是他的一个缺点。但他作为一个好官员的名声是早就有的。在今天的杭州西湖，有两条游人必到的长堤横亘湖中，一条叫白堤，一条叫苏堤。堤上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景色宜人。这苏堤就是苏轼在担任杭